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陈积敏

摘 要 对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关系变量。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其演变方向总体趋于积极。这一变化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忽视。

关键词 奥巴马政府 国家身份 中美关系 战略认知

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 2010 年的中美关系更是经历了太多波折,这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了几分“雾里看花”的朦胧感与不确定感。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紧逼态势令许多中国人感觉到,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美国国内,有些人将奥巴马政府对华决策圈划分为两派,即对华“失望派”或“强硬派”与对华“磕头派”(“kowtow” group),如今之势似乎表明奥巴马政府开始扭转其与中国的“蜜月期”,重新采取对华强硬政策。^①然而,美国对华战略是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仅要看近期美国的外交布局与政策调整,还要从更长期、宏观的视角去观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美国对华战略,从而更冷静、客观地认识、判断和评估当前的中美关系。

* 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91)。

① Bill Gertz, “China Policy Fight”,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0, 2010,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oct/20/inside-the-ring-875212385/print/>.

一、国家身份与美国大战略

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一直都是国际关系学界讨论与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与界定更是国际关系学者尤为关注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各国在处理外交关系中必须要首先厘清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何谓“国家身份”?它与美国大战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笔者首先对此做简要的分析与阐释。

亚历山大·温特把“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与行为特征。据此可知,在温特看来,“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上的特征,根源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又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故“身份”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因而,“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①显然,国家身份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自我认知与他者建构。所谓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识与判定。换言之,“国家身份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②然而,国家身份仅从自我认知的角度是难以最终确立的,还需要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可。即是说,国家身份的确定也是个他者建构与认同的过程。^③可见,国家身份主要回答了“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

大战略^④是指能够长期指导国家发展方向并且通过运用国家整体资源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思维和艺术。^⑤它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战略,即政治实体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自身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争取实现自身的根本目标。^⑥因而,它具有长期性、全局性与战略导向性的特点。大战略在美国从新生的弱国发展成为地区大国继而成为全球霸权国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⑦可以说,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282 页。

②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349 页。

③ 很明显,对他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换言之,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只能表明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一种主观认识,并不能最终界定中国的国家身份。但是,正如下文所谈到的,这种主观建构将对美国对华战略产生影响。

④ 关于“大战略”的含义,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理解,即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胡鞍刚、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周丕启《合法性与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⑤ 门洪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意义》,载胡鞍刚、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 1 页。

⑥ 时殷弘、于海峰《论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⑦ (美)查尔斯·库布乾《美国时代的终结》,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 页。

美国既是各种大战略思想的盛产地,同时也是这些大战略思想的受益者。很显然,美国大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并维护利益,这要求其首先确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界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灵活运用各种资源与手段达成目的。

显而易见,国家身份与美国大战略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与维护者,美国十分重视对其他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判断,并将其作为美国制定外交战略的重要考察因素。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90年撰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的敌人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界定的任务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当缺乏值得一提的敌人时,很难明确制定外交政策。毕竟,是国家的敌人帮助定义了国家利益,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定义。如果没有这样的敌人,国家就会在大量相当琐碎的或者至少是边缘的选择中踌躇。”^①不仅如此,对其他国家身份的认知也是美国确立自我国家身份的重要参照。换言之,美国是通过确定“他者”来发现“自我”的。这并不奇怪,萨义德对此曾做过精彩的表述:“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却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②塞缪尔·亨廷顿也指出,“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③然而,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他者”,冷战后美国出现了身份危机,以至于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难怪查尔斯·克劳萨默会发出“国家需要敌人”的感慨。^④199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这样写道:“有些人说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为敌,然后在冷战中与苏联为敌,现在谁会被指定为敌人?有人指向日本;有人指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到了一定时候,无疑会宣告其他潜在敌人的存在。”^⑤可见,在后冷战时代,“寻找敌人”便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美国通过对其他国家身份的认知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从而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针对不同的对象(盟友、伙伴、竞争者,抑或是敌人)采取不同的战略,实现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国家身份与美国大战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具体而言,国家身份的界定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影响美国大战略的重要因素。^⑥显然,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不仅是美国制定对华战

① Irving Kristol, “The Map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1990; Irving Kristol, “In Search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1990. 转引自李鹏《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与台湾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第2页。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Republic*, December 19, 1988, p. 18. 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7页。

⑤ 王缉思《“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第2页。

⑥ 李慧明《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影响因素、演变模式及其与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关系等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那么,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其中反映出中美关系都具有哪些特点?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影响如何?下文将主要就上述问题做出论述与分析。

二、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的深化

20 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几经变迁,从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盟友演变为冷战初期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然而,随着冷战形势的发展,当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时,两国又超越了意识形态隔阂,再次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关系。冷战的终结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着新一轮的调整。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影响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焦点,而美国对中国的身份认知与战略定位也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来自于美国政府所发布的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文件以及美国政要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①

战略定位之一:中国是美国的“改造”对象。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政府依恃其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盛极一时。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打造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一方面防范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防止新对手的重现”;^②一方面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号,试图改造所谓的“异类”国家,而中国便成为美国重点防范与改造的对象。由于当时的美国实力超群,以其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成为国际社会唯一合法、合理的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处于历史上的低点。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质疑论”甚嚣尘上。^③然而,历史并没有依照美国人的设计发展,中国不仅未发生大的动荡,而且发展后劲十足。这既令美国感到十分意外,也令其忧虑万分,于是“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不断被提及、渲染。^④总的来说,

① 实际上,美国学界对于冷战后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中主流的身份认知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影响,主要包含两种观点,即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共存。详见陈积敏《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和平与发展》,2009 年第 1 期,第 64—68 页。

② “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http://s3.amazonaws.com/911timeline/1990s/nyt030892b.html>.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ragile Futur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1, No. 3, Fall 1994, pp. 41—45.

④ 王缉思曾经概括指出美国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五种论据,即“极权威胁论”、“实力地位扩张论”、“经济挑战论”、“文明冲突论”以及“邻国恐惧论”。参见王缉思《“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第 3 页。

这一期间,中国不是被美国塑造成行将崩溃的“失败者”,就是被塑造成威胁其利益的“敌人”,但更多地是被塑造成美国“教育改造”的对象,“接触通常以美国向中国官员解释应该如何改变他们行为的方式进行,忽视了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台湾地位时中国人的感受。”^①此时的中美关系呈现出施压与抗压、制裁与反制裁的特点,同时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即美国方面占据了绝对主动的位置,中国方面则更多地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美国的对华战略定位以及中美关系的不对称性导致两国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发生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事件(如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令中美关系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②

战略定位之二:从“战略竞争者”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由于受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小布什执政初期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对中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并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如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③然而,“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保卫美国国土安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并为此连续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于外部威胁的感受以及自身实力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美国意识到恐怖主义是其国家安全最大的、最现实的威胁。“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事件令美国认识到,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传统大国对美国霸权所构成的挑战,而是来自于极端主义者的恐怖袭击行为。小布什总统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明确提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④在反恐过程中,美国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进一步促使美国改变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其次,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认知也有了新的变化。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及纷繁多样的全球性问题,美国自感能力有限,无法仅凭一己之力便解决所有矛盾,“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

①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 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p. 48.

② 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9日,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其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强调指出“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与《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使得中美关系迅速升温。次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两国元首互访使两国关系发展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点。然而,由于两国间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未能得到保持,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突出。参见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324页。

③ 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明确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这种思想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其执政团队中有很多人持此观点。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表示,美国必须调整其军事战略,以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观点未能正确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小布什政府很快调整了对华战略思维。参见 Tony Karon, “Bush China Policy Defaults to Engagement”, *Time*, July 31, 2001, <http://www.time.com/time/columnist/karon/article/0,9565,169585,00.html>.

④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September 2002,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tional/nss-020920.pdf>.

希望通过巩固传统战略盟友关系,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来缓解美国所面临的诸多压力。随着对外部威胁与自身实力认知的变化,美国政府对美国崛起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2005 年 9 月 21 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就对华关系发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①随后,该提法被正式写入 2006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新战略定位。^②该战略定位一方面表明美国政府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基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难以改变的现实,美国希望一个崛起的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

战略定位之三: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竞选期间谈到对华关系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③这种关系定位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其一,美中两国之间在现实利益、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甚至是原则性分歧。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将会深刻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其二,美国认识到中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美中之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这决定了两国可以而且需要携手应对挑战。对此,奥巴马也有明确的表述,“奥巴马政府将寻求与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从而推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展。”^④2009 年 1 月 30 日,刚刚就职的奥巴马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通电话时再次表示,美国政府愿意继续深化对华合作,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⑤2 月 20—22 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中国,也阐释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外交思维,即美国不因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到两国间的合作,“我希望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不会妨碍其他更广泛问题的解决。”^⑥由于美国政要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地位与作用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这使得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后避免了历次美国政府换届后所产生的“周期性震荡”,两国关系平稳过渡,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在日本发表了亚洲政策演说,再次明确指出,美中两国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在一个互通互联的世界,实力不必是零和游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必担心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⑦在此后的访华

①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②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6/nss2006.pdf>.

③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p. 12.

④ Barack Obama,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http://www.amcham-china.org.cn/amcham/show/whatisnew.php?Id=89>.

⑤ 《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新华网,2009 年 1 月 3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1/31/content_10738671.htm.

⑥ 《希拉里访华:经济先于人权 合作重于分歧》,新华网,2009 年 2 月 2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3/content_10875221.htm.

⑦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November 14,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行程中,中美两国元首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①将中美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0年初,因为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事件,中美关系遭遇了发展困境,并一直处于震荡之中。^②然而,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5月,奥巴马在其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欢迎中国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从而“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认为,“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是奥巴马政府对新的战略定位。^④这一新战略定位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1)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了中国崛起的现实,更加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2)两国关系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3)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国际责任分担者。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更加现实、客观、全面:既认识到中国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给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机遇。10月28日,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发表美国亚洲政策演说,就中美关系做出了如下表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影响巨大,我们致力于处理好这个关系。目前,两国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利益与我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看法。在21世纪,美中两国互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对手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⑤2011年1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⑥1月19日,两国元首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同时,两国元首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

① 《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第2版)。

② 2010年初美国对台售武、奥巴马会见达赖、中美贸易之争集中爆发,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很大挑战。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笔者认为,第三方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导致2010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主要原因。参见陈积敏《第三方事件与中美关系》,联合早报网,2011年1月12日,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us110112a.shtml。中国学者滕建群也对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做了专题论述,参见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5—10页。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④ 郑永年《美国的新的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联合早报网,2010年6月1日,http://www.zaobao.com/yl/yl100601_001.shtml。

⑤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41.htm。

⑥ 这次访问被普遍认为是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发展确立基调与方向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参见《胡锦涛启程访美》,《京华时报》2011年1月19日,第A4版《基辛格:胡锦涛访美对中美关系未来至关重要》,中国日报网,2011年1月15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01-15/content_1580814.htm。

纪的机遇和挑战。”^①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更加明确、更具导向性,两国的合作意识更加强烈、合作领域更为宽泛、合作方式更加机制化。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深刻表明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没有发生重大转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从总体上看,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不断深化,其考察的角度与涉及的议题领域也日益多样化,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政治色彩愈加明显,而意识形态因素逐渐减弱(但并未消除),表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渐趋理性化。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反映出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特点,即“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关系。^②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这一特征不仅成为美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识,而且也成为中国领导层的主流观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评价中美关系时就曾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但同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③可见,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双重特点已经成为两国领导层的一种共识。当然,竞争既有公平竞争与良性竞争,也有不公平竞争与恶性竞争。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美双方应当积极作为,将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控制在良性互动方面,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朝着积极、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若干要素

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可从两个层次来加以考察。

(一) 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1. 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兴起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度调整与转型时期,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权力正在显现新的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兴起,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 2008 年 11 月发表的《2025 年全球趋

①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11 年 1 月 2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0/c_121001428.htm。

② 需要指出的是,该特征的两大要素,即竞争性与依存性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议题上的比重存在不对称性与非均衡性,因而具有不稳定的特点。两者的比例分配将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外在表现趋于积极还是消极。从目前情势来看,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竞争性要高于依存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依存性高于竞争性。在经济领域,依存性的强度在削弱,竞争性强度在增加,但依存性仍高于竞争性。

③ 《胡锦涛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09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9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势》中估计,“眼下正在经历的这场空前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大致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到2040—2050年,非西方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即“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七大国之和。^①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在过去500多年里,世界经历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换,即西方世界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以及当下正在呈现的“其他力量的崛起”。^②同时,他对美国在当前权力转型中的地位做了分析,认为在政治—军事层面,美国仍处于单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在其他领域——工业、金融、教育、社会、文化——权力配置正在发生转换,远离美国主导地位”。^③2010年末,《经济学家》也撰文指出,东方社会充满了生机活力,而西方社会却弥漫着悲观情绪,这“正在重塑政治生活”。^④

2. 国际政治的中心点加速向东方转移

从当前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来看,亚洲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分离状态是冷战历史的见证;伊核、朝核问题跌宕起伏,前景扑朔迷离;全球反恐主战场集中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巴以和平进程仍举步维艰,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亚洲地区局势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作为一个有着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必然要对这种国际格局的变迁做出反应。实际上,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已经逐渐向东倾斜,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亚洲四国作为其首访地,到奥巴马总统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高调宣布美国要“重返亚洲”,再到美国受邀参加东亚峰会,积极参与亚洲区域机制建设,以及克林顿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的密集亚洲之行等等,都昭示着美国外交主轴的微妙转变。中国作为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关键国家,必然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中心与重点。同时,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对外战略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在现实利益中的纠葛纷争,美国这一外交战略的调整必将导致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更趋激烈。^⑤但是,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也更加复杂多样。在此情形之下,美国一方面寻求进一步完善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这要求美国在加强与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应对现实挑战中,美国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性,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⑥可以说,

①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②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pp. 1—2.

③ *Ibid.*, pp. 4—5.

④ “The Distribution of Hop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8th–31st, 2010, p. 13.

⑤ 2010年10月27日—11月8日、11月5—14日,克林顿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先后展开亚洲之行。对此,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美国发出的强烈而明确的信号,即美国将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发挥其领导作用。同时,美国试图通过巩固与其亚洲盟国与伙伴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⑥ 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现明显。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或可参见陈积敏《美国领导: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4期,第40—45页。

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既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与变数,也为两国深化合作提供了可能与新的机遇。

(二) 国家行为的影响

1. 美国的国家行为

中美两国的国家行为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最直接的因素。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占据着主动权,美国的国家行为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中美国能否尊重和妥善处理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最为关键的问题。^①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所言“如果美国真的寻求与中国和平相处,并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政策,那么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②从历次中美关系危机可以看出,一旦美国政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不适当的政策,中国政府都会做出及时、坚决的反应,这种反应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政府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府常常为了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如选举政治、利益集团影响)而利用对华政策大做文章,^④但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和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核心利益。^⑤这就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最基本、同时也最关键的 political 条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家行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现实政治因素之外,美国的战略文化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虽然是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社会,但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并非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其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使命观”思想不断促动美国政府在海外推广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与制度体系。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始终萦绕在美国决策者心头,也常常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行为之中,从运用武力“铲除暴政”,到幕后操作“颜色革命”,再到近期隐身激化“利比亚危机”,不一而足。美国此种国家行为不仅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同时也与中国所秉持的原则与理念背道而驰,当然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2. 中国的国家行为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其国家行为必将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而

① 《胡锦涛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

② David Shambaugh, “A New China Requires a New U. S.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Vol. 109, No. 728, September 2010, p. 222.

③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阐述了中国核心利益所包含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参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3日,第6版。

④ 选举政治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因素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历史证明,中美关系往往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对台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等问题都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2010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又一次将焦点指向了中国,并且借助于攻击中国,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赢取国内选民的支持,从而使得本已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再次证明了美国的国内政治行为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参见 David W. Chen, “In U. S. Races, Foes Criticize One Another over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1, 2010, p. 1.

⑤ 《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

维护和巩固当前国际体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时最为关心的一点就是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内崛起,还是要突破既有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很显然,美国期望中国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不是颠覆者。换言之,美国希望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内的新兴国家崛起。

那么,中国的国家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挑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①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更不会寻求霸权地位。2011年1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发表了题为《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演讲。他指出“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②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与其他国家良性互动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为完善与改进现有国际体系做出努力与贡献的过程,中国通过自身的国家行为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中国不做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与完善者。这一国家定位在中国的战略性文件中也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③不仅如此,中国的学术界在探讨中国的国际定位时也充分论证和强调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④由此可见,中国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完善者的身份不仅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且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理论支撑。事实上,西方舆论对此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根本没有兴趣同美国争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中国关心的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经济发动机。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是不利于贸易发展的。换句话说,

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家行为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同时,外界对于中国如何使用这一力量资源产生了很大的疑惑与忧虑。中国政府需要正视其他国家关于中国战略意图的合理关切,这不仅需要中国进一步阐明其未来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同时更需要中国谨慎、智慧、灵活地运用自身资源,应对来自现实的各种挑战。

② 胡锦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0年1月21日,第2版。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49页。

④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2页。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寻求的是体系更新,而非体系更迭。

四、战略认知态势与中美关系之前瞻

可见,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从当前情势来看,无论是国际格局因素还是国家行为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都将继续存在。从国际大环境而言,两国既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又存在深化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国家行为的角度考察,中美双方都是两国关系的建设者和“利益攸关者”,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将影响到另一方的行为,并且会因此产生连锁反应。因此,中美需要在扩大共识与利益契合点的基础上,审慎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既不能漠视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也不能无限放大这些分歧与矛盾,更不能任其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就目前中美关系现状而言,虽然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两国关系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不过,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不能不对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动作有所警觉,但同时也不能预设前提,先入为主,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过度解读,以免失去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机遇。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一个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反映出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新特点。目前,两国战略界都认识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同时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因此,两国关系的发展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能够出现大的波折,更不能够出现倒退。事实上,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竞争与相互依存”的特点,决定了两国关系将会不断的利益调适中向前发展。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博弈,也不再表现为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新时期的中美关系理应对这一现实的诠释与反映。中美两国应调整心态,建立起对对方的合理预期,慎重对待和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共同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李 丹)

① 王帆《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26页;Fareed Zakaria, “A ‘Hedge’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5,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1/14/AR2010111403883.html>.